

《管子》国家间政治思想初探^{*}

刘江永

内容提要 本文旨在揭示管仲作为齐国宰相何以辅佐齐桓公实现崛起的理论基础。作者分析了《管子》所提出的建立霸业与王权两个不同的国家崛起目标的内涵,以及建立霸权王业的强国战略。作者认为,尽管《管子》并非均由管仲所作,并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其中充满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和辩证的系统思维,这些古代治国智慧对当代中国外交战略的制定及构建和谐世界都具有参考意义。

关键词 《管子》 霸权 王业 国家间政治

管仲(公元前 719—前 645 年),名夷吾,字仲,谥敬,故又称管敬仲,颖上人,春秋初期曾担任齐国的宰相,曾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被齐桓公尊为“仲父”。他是中国先秦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战略家和思想家。《管子》一书是介绍管仲思想及其从政经历的一部传世之作,其中融汇了中国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各家流派的思想,并包含有相当丰富的国家间政治思想,例如,

* 在拙文写作和修改的过程中,一些专家学者的赐教使我受益匪浅,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国际政治科学》2008/3(总第 15 期),第 36—56 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诚信者,天下之结也”,“故邻国亲之,与国信之。有患则邻国忧之,有难则邻国救之。”该书最精彩的部分之一是如何认识和处理诸侯国之间关系,促使齐国成为春秋霸主的政治思想,体现了中国古代贤哲有关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智慧,值得后人借鉴。

本文所述管仲的国家间政治思想,主要是依据对《管子》一书中相关论述的整理而成。《管子》一书非管仲一人所著,但书中包含的哲理和政治思想仍堪称是中国先秦时期政治思想的一大宝库。

一、对于国家实力的认知

齐桓公继位之初,齐国刚经历过一场严重内乱,国力衰落。作为齐国宰相,管仲上任后的第一要务是提升齐国国力,为日后称霸中原打下物质基础。《管子》主张以农为本、国富兵强、重视军备。在《管子》有关国家富强的概念中,“富”和“强”是相互联系的两个不同概念。“富”要以农为本,“强”则要靠军队,两者相辅相成,但不能相互替代。因为,在管子看来,只有国富而无兵强,则国富难保;只有兵强而无国富,则兵强难维。

(一) 农业乃富国之本

中国自古以来具有农耕民族的特点,历来认为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在管仲看来,强兵必先富民,要富国必先兴农,即所谓“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粟者,王之本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途,治国之道也。”这实际上是一种以农耕经济优先的国富兵强之路。

《管子·枢言第十二》。

《管子·形势解第六十四》。

《管子》一书最早相传有 389 篇,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大多亡佚,后经西汉刘向审校并删除重复者后定为 86 篇,但有 10 篇在唐代之前便已遗失,现仅存 76 篇。孙波注释:《管子》前言,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0 年版。

有人推测,《管子》可能是齐桓公设立的所谓“稷下学宫”集体编撰的,也有人认为本书只不过是挂了管仲名字的“伪作”。另外,书中一些篇章的行文像是一部描述管仲治国思想与实践的史书,很可能是从春秋战国时期至西汉,由别人续写的。

《管子·治国第四十八》。

《管子》明确指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这是因为，“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必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认为，富国富民都要靠农业，“粟多，则国富”，“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凡五谷者，万物之主也”，“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若没有粮食，城是守不住的。

管仲认为，富国富民都要靠农业。他指出：“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农事盛则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他认为，农民要以农为本，“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民众、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这里管仲所说的“末作”和“奇巧”是指农业以外的生财之道。那些与农业这个“本”相比，只不过是“末”而已，明君要禁止本末倒置，偷奸取巧。因为“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也矣。”

管子认为，粮食是国家实力的最根本的物质基础。粮食的多少决定了人口的多少，粮多则人口增加，粮少则人口减少。而人口多少决定了军事实力的大小。只有增强军事实力才能扩大土地面积，从而实现国家的富强。管子认为民富仅是国家实力地位的基础，但民富并不等于国家富强。因为国家实力地位是指国家总体能力，而非人均财富的多少。

相反，若“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轻家则易去，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则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则战不必胜，守不必固矣。于是，便“命之曰寄生之君”，即君王短命即将灭亡，“寄生”为“暂寄为生”之意。作为警世枢言，《管子》称：“得之必生失之必死者，何也？唯粟。得之，

《管子·治国第四十八》。
《管子·治国第四十八》。
《管子·国蓄第七十三》。
《管子·治国第四十八》。
《管子·权修第三》。
《管子·治国第四十八》。

尧舜禹汤文武孝己,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生,故先王重之。一日不食,比岁歉;三日不食,比岁饥;五日不食,比岁荒;七日不食,无国土;十日不食,无畴类,尽死矣。”

(二) 军队乃强国之基

在管仲看来,无论在稳定国内地方势力还是抵御外敌,都要增强国家和军队的实力。因为“内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战不能制敌,侵伐不能威四邻,而求国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于弱小,威不信于强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诸侯,不可得也。威有与两立,兵有与分争,德不能怀远国,令不能一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再有,“不能强其兵,而能必胜敌国者,未之有也”,“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凡国之重也,必待兵之胜也,而国乃重”,同样“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君之所以卑尊,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故诛暴国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则兵者外以诛暴,内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不可废也。若夫世主则不然,外不以兵,而欲诛暴,则地必亏矣;内不以刑而欲禁邪,则国必乱矣。”这里,管仲把军队作为国家机器的职能讲得相当全面,不仅有对外职能,也有对内职能,核心是维护本国安全,强调国家安全的根本莫过于军队。

《管子》认为,地广是国富的必要条件。在农业社会时代,农业技术不能大规模地提高单位产量,增加国家财富总量的唯一方法是扩大土地面积,而确保和扩大土地面积只能靠军事力量。因此管子认为军事实力是国家经济基础的思想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在管仲的眼中,评价一国之君的功过得失,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是看国家是否富强。《管子》指出:“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故国富兵强,则诸侯服其政,邻国畏其威,虽不用宝币事诸侯,诸侯不敢犯也。主之所以为罪者,贫弱也。故国贫兵弱,战则不胜,守则不固,虽出名器重宝以事邻敌,不免于死亡

《管子·枢言第十二》。

《管子·七法第六》。

《管子·重令第十五》。

《管子·参患第二十八》。

之患。”

国家强大的标志是军队战无不胜,即“凡国之重也,必待兵之胜也,而国乃重。”因而国君必须要增强军队的实力,否则就会“内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战不能制敌,侵伐不能威四邻,而求国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于弱小,威不信于强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诸侯,不可得也。再有,“不能强其兵,而能必胜敌国者,未之有也”;“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显然,管子将军事实力视为国家安全的根基。

《管子》认为兵器乃战争中制胜的关键。《孙子兵法》强调“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用兵靠五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但孙子兵法没有讲“器”,似有其局限性。与《孙子兵法》不同的是,《管子》非常强调军队武器的重要性,甚至认为“故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兵不完利,与无操者同实;甲不坚密,与伐者同实;弩不可以及远,与短兵同实;射而不能中,与无矢者同实;中而不能人,与无镞者同实。”《管子》指出:“器械功,则伐而不费”;“审器而识胜”。因此他主张“求天下之精材,论百工之锐器”,提倡掌握最先进而精良的武器。从这个意义上讲,管仲是唯物主义者,管子兵法是对孙子兵法极好的补充。

(三) 以德为核心的软实力乃王者必备

管仲认为,国称霸以兵,为王以德;国可以力谋霸,但要以德称王。管仲主张巧妙运用“力”、“德”、“信”所构成的综合国力,先建立齐国霸业,最终复兴周室王权。《管子》指出,“德共者不取也,道同者不王也。夫争天下者,以威易危暴,王之常也。”这句话表达了管仲对王权国家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方面的基本价值判断,即作为享有王权地位的国家,对遵守共同道德规范的诸侯国友好相处而不攻取;国之所以要争天下,就是要以自身权威除暴安良,替天行道。不

《管子·重令第十五》。

《管子·形势解第六十四》。

《管子·七法第六》。

《管子·参患第二十八》。

《管子·兵法第十七》。

《管子·幼官第八》。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过,当时的所谓“天下”,并不是现在意义上的世界或国际体系,而是指诸侯并立的中国周朝天下。正如《管子》所云:“夫无土而欲富者忧,无德而欲王者危,施薄而求厚者孤”;故要“以明威之振,合天下之权;以遂德之行,结诸侯之亲”。

那么,何为德?何为道呢?《管子》称:“爱民无私曰德,会民所聚曰道”;“致德,其民和平以静;致道,其民付而不争”。进而言之,对人民“爱之、生之、养之、成之、利民不得,天下亲之,曰德”。可见早在 2600 多年前的中国,道德就被视为一种无形的巨大感召力和成就王业的必备条件。这实际上就是今天国际上常谈论的“软实力”。

20 世纪 90 年代初,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所谓“软实力”概念,即一国通过吸引和说服别国服从你的目标从而使你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能力。用《管子》的话说,“独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独断者,微密之营垒也。此二者,圣人之所则也。”这里的“独明”即独具慧眼的正确判断;“独断”即独具一格的正确决策。这二者是圣人所要具有的。美国资深外交官傅立民也曾提出国家力量中政治与文化力量的重要性。他从外交角度指出,政治力量是看“一个国家能否使他国对本国政策心悦诚服,能否将他国团结在本国目标之下,能否他国将自身利益服从本国利益。而文化力量则指“一国能否激发他国仿效的思想、钦佩其成就和使用其语言”。与美国人的想法所不同的是,《管子》提倡的道德力量,似乎主要是强调霸权国领导人——国君的人格力量及其对民众和诸侯国的感召力。

二、如何建立霸业与王权

管仲认为,天下主导国有霸权和王权两类国家;一国也有霸权或王权两种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管子·正第四十三》。

《管子·正第四十三》。

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傅立民:《论实力:治国方略与外交艺术》(刘晓红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2—13 页。

选择,以及从建立霸业到实现王权的不同发展阶段。当时管仲进谏齐桓公:当今周天子幼弱,而诸侯强悍,不朝拜、不进贡。主公应削弱强悍的诸侯,延续灭亡的小国,率领诸侯复兴周王室。这就是管仲建立齐国霸业的政治目标,但他并不认为齐桓公能在称霸后取代周朝称王。

(一)《管子》关于霸业与王权的概念

在春秋时期的国家间政治中,成就霸业和王业,或许是各诸侯国追求的共同目标。《管子·霸言第二十三》首先就“霸”和“王”两个不同的概念做出界定和区分:“夫丰国之谓霸,兼正之国之谓王”;“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也就是说,能使国家强盛者称为“霸”(霸业),而能匡正天下者称为“王”;能控制天下一半者为“霸”,能得到全天下拥戴者为“王”。“霸”的本质是强权与硬国力;“王”的本质是在硬实力基础上同时兼有强大的软国力,即对其他国家的感召力、亲和力与凝聚力。《管子》认为,凡是获得天下的,靠人心取天下者成帝业,靠事业取天下者成王业,靠征战取天下者成霸业。以力服人难得人心;以实力为后盾且以德服人才能使天下归之。

《管子》所说的“天下”,实际上是周朝所辖的整个中国;所谓“王”就是他所推崇的“先王”周文王所开创的王朝;所谓“霸”就是做天下各诸侯国的盟主。另外,《管子》中所谓“霸”的概念还有两重性:一是作为超群实力地位的优越性;二是作为政策选择的偏差性。而“王”的概念则是强大实力与崇高道义两者合一,即管仲复兴周王室的终极国家目标。

虽然在管仲的战略思想中,“霸”与“王”有不同,但两者并非完全对立,实际上两者有互相衍生的关系,即“霸”是“王”的基础,“王”是“霸”的发展。故《管子》经常将霸、王并称。例如,书中称,所谓“霸王之形,象天则地,化人易代,创制天下,等列诸侯,宾属四海,时匡天下。大国小之,曲国正之,强国弱之,重国轻之,乱国并之,暴王残之。”但《管子》同时强调:“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也就是说,王权不能只靠霸主地位或实力,而必须按天道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行事,若“失天之道,虽立不安”。

这个天之道,就是道德、道义与客观规律。在管仲看来,国家在崛起过程中“必先争谋,争形,争权。这是因为,“精于谋则人主之愿可得,而令可行也;精于形,则大国之地可夺,强国之兵可围也;精于权,则天下之兵可齐,诸侯之君可朝也”。而获得优势后,就应恩威并用。根据《管子》的论述,似可将管仲的霸王战略及策略运用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多强并立时不宜过早称王,而应联强攻弱,后发制人。《管子》认为,“强国众,而言王势者,愚人之智也”;“强国众,先举者危,后举者利”。在这一阶段,对“近而不服者,以地患之;远而不听者,以形危之。即,对近处不服的国家靠占地威压;对远处不服的国家以强势威慑。这一点,与美国国际政治学者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的论点颇为相似。摩根索认为:“我们在讲到权力时,是指人支配他人的控制力。这种影响源于三个方面:“对利益的期待、对损失的恐惧、对领袖或制度的景仰和爱戴。”英国在19世纪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因为它颇具匠心设计了这样一种政策:使别国意识到与英国为敌太危险又无必要。其实,这也正是管仲所追求的国家间政治的心理效果。当群雄争霸时,若不增强实力而先讲仁义道德,可能会被列强吞食,所以必须先求生存壮大。

第二阶段,强国减少时应先发制人,联小攻大,但不搞霸权。《管子》提出:“战国众,后举可以霸;战国少,先举可以王”;“强国少,先举者王,后举者亡”;“强国少,而施霸道者,败事之谋也”。这是因为,在强国林立争霸时,要建立霸业而非王道方可求生图存;强国少时却要借机称霸则不可取,反而应率先实行王道,占据道义的制高点。如果相反,便不能称霸为王。因为当只有少数强国并存在时,要得到多数国家的支持就不能对别国搞霸权,而要以德称王,否则会为渊驱鱼,导致本国孤立。在这一阶段,《管子》主张,“二尔伐之,武也。服

《管子·形势第二》。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 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徐昕、郝望、李保平译,王缉思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而舍之,文也。文武具满,德也。”即,对有二心谋反者讨伐,是武;对服从者宽容,是文。文武兼备,是德。

在齐桓公看来,“霸”与“王”也是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与权力等级范畴。他完成霸业后也曾想升级完成王业。据《管子·小问第五十一》记载,齐桓公曾问管仲:“我想成就霸业,靠得是你等几位贤臣之功。现在我又想完成王业,你看能行吗?管仲未答而请鲍叔牙作答,鲍叔牙又请宾胥无回答。宾胥无直言道:“古代成就王业的都是君主德高,而大臣的德较低,现在则是您的大臣德高。齐桓公听罢承认儿子不如自己,自己不如贤臣,所以注定难成王业。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王权基于霸业又高于霸权。王权对明君圣主有极高的道德要求,甚至需要几代明君的努力才能实现。

(二) 如何建立霸业王权

《管子》一书中称,“霸王之形,德义胜之,智谋胜之,兵战胜之,地形胜之,动作胜之,故王之。”其意为,所谓王者,就是要拥有霸王的优势地位,在实力、道义、智谋、军事、地势、行为等方面胜过别国。“夫无土而欲富者忧,无德而欲王者危,施薄而求厚者孤。这是管子所谓霸王之道之箴言。关于如何获得霸权和王权,作为战略家的管仲在总体原则、时机选择和具体做法上有一整套自己独到之处。

1. 纵横捭阖,顺势而为。在霸权争夺战中,管仲认为,“夫善用国者,因其大国之重,以其势小之;因强国之权,以其势弱之;因重国之形,以其势轻之。强国众,合强以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合小以攻大,以图王。这是指,要战胜对手制霸,首先要善于建立本国的大、强、重的优势,造成对手小、弱、轻的劣势。

管仲主张,霸者要以小制大,以弱胜强;王者要扶弱抑强,以德服人。《管子》认为,“夫国小大有谋,强弱有形。服近而强远,王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以负海攻负海,中国之形也;折节事强以避罪,小国之形也。”这里,管仲强调了国家之间纵横捭阖的几种态势,即国家无论大小都有自己的谋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略,无论强弱都有自己的态势。以邻国诚服来强化同远方国家的关系,是王者的态势;联合小国攻大国,是针对敌国的态势;以靠海之国攻靠海之国,是中原国家的态势;低头服从强国以免遭惩罚,是小国的态势。

《管子》认为,国家大小、强弱的态势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管子还提出如何以弱胜强,促成强弱态势转换的某些规律。“夫轻重强弱之形,诸侯合则强,孤则弱。骥之材,而百马代之,骥必罢矣。强最一代,而天下攻之,国必弱矣。”这句话的意思是,即使再好的宝马良驹,如果用百匹马轮番与其比赛,也会把它累垮;即便是一个时代最强的国家,如果天下各国都攻击它,该国也会衰弱。善用国力与外交权谋者,面对大国、强国,可以借对方之势,缩小、削弱和矮化对方。因为国家强弱态势不仅取决于力量对比,还取决于关系的组合。合则弱可变强;孤则强可变弱。

2 审时度势,善抓时机。管仲认为,“君人者有道,霸王者有时”;“圣人能辅(捕捉)时,不能违时”。管仲指出,军事行动要“视天下之形,知动静之时;视先后之称,知祸福之门。他认为,“自古以至今,未尝有能先作难,违时易形,以立功名者;无有常先作难,违时易形,而不败者也。故“夫欲臣伐君,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独攻而取也。必先定谋虑,便地形,利权称,亲与国,视时而动,王者之术也。”

这里所谓时机有两“谋霸”与“称王”两层含意:一是指谋霸要“以备待时,以时兴事,时至而兵举。管子认为:“智者善谋,不如当时。精时者,日少功多。夫谋无主则困,事无备则废。是以圣王务具其备,而慎守其时。”二是指称王者须知“国修而邻国无道,霸王之资也。”在管仲眼中,本国政通人和而别国无道乃是建立霸王之业的机遇期。本国平时要有道德素质和软力量的积累,不断提升道德修养,而一旦别国发生不当之举或战略决策失误,那么即是迅速提升本国地位的可资利用之机。

《管子》指出,“天下有事,则圣王利也。国危,则圣人知矣。夫先王所以王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者,资邻国之举不当也。举而不当,此邻敌之所以得意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天下发生战乱则对圣王有利。国家发生危机,圣人就会知晓。先王之所以能称王,就是善于利用邻国的失误。同样,自己举措不当,则会使邻近敌国得意起来。

为能做到审时度势,善把时机,要靠宰相智囊,即“知盖天下,断最一世,材振四海,王之佐也。”管仲指出靠谋略制胜,一要有备;二要善抓机遇。这样便可“绝坚而攻国,破大而制地,大本而小标,全近而攻远。以大牵小,以强使弱,以众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诸侯而不拂,近无不服,远无不听。夫明王为天下正,理也。按强助弱,围暴止贪,存亡定危,继绝世,此天下之所载也,诸侯之所与也,百姓之所利也,是故天下王之。”

3. 运筹经贸,不战而胜。管仲通过非军事手段降服一些诸侯国的方法是,在战略和战术方面成功地运用经济手段。《管子·轻重戊第八十四》便详细记载了管仲向齐桓公献策,以经贸手段降服各诸侯国的经过。如表1所示,齐桓公接受了管仲的建议,通过贸易、货币和价格手段,欲擒故纵,使鲁国、梁国、莱国、莒国、楚国、代国、衡山国为获利而增加对齐国的经济依赖关系。当这些国家农业削弱而在粮食贸易上对齐国产生严重依赖时,齐国突然通过限制进口和粮食出口,使这些诸侯国陷入粮食危机,民众大多投奔齐国,导致这些国家的国君最终也不得不归顺齐国。

因篇幅所限,这里仅举其中一个案例。管仲进谏齐桓公:“鲁、梁两国的百姓历来以织绌为业。您可带头穿绌做的衣服,令左右也穿,百姓就会跟着穿。您再接着下令齐国不要织绌,必须从鲁、梁进口,这样鲁国、梁国就会放弃农业而都去织绌了。齐桓公照办,管仲又告诉鲁国、梁国的商人说:“你们为我采购绌一千匹,我给你们三百斤金。”于是,鲁、梁两国就让其百姓织绌。十三个月后,管仲又对齐桓公说:“您可以改穿帛衣,带动百姓不再穿绌。封闭关卡,不与两国通使往来。”十个月以后,鲁、梁两国的民众相继陷于饥饿,鲁、梁两国赶紧下令百姓转而务农。但粮食不可能在三个月内生产出来,鲁、梁两国的粮食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每石一千钱,而齐国的粮食每石才十钱。两年后,两国十分之六的百姓投奔齐国。三年后,鲁、梁两国的国君也请求顺服。

表-1 管仲以经贸手段迫使其他诸侯国三年内降服归顺的案例

案例	降服的诸侯国	经济特点	欲擒故纵	对方反应	限制手段	措施结果
1	鲁国、梁国	织绌业较兴旺	齐桓公带头穿绌,高价购绌	为获利而弃农织绌	一年后封闭关卡禁止贸易	粮价暴涨鲁梁顺服
2	莱国、莒国	盛产苳草可做染料	大量造币,高价够苳草产品	为获利而弃农产苳	两年后封闭关卡禁止购苳	粮价暴涨莱莒顺服
3	楚国	山中有鹿	齐国高价购买出国的鹿	为获利而弃农猎鹿	三年后封闭关卡禁止购鹿	粮价暴涨楚国顺服
4	代国	产白狐皮	高价购买代国的白狐皮	为获利而弃农猎狐	代国弱而招致离枝国入侵	代国求救归顺齐国
5	衡山国	兵器制造较擅长	高价大量购买衡山国兵器	为获利而弃农造器	一年半后停购兵器不买粮	该国不敌齐鲁而降

材料来源:根据《管子·轻重戊第八十四》内容整理而得。

上述案例对我们的启示是:利用造币、价格制定权和贸易禁运等手段,有时可以到达战争所难以达到的目的;国家间经济制裁的有效实施必须首先造成严重的不对称相互依存关系,即别国对本国严重的单边依赖;国家间经济制裁的有效实施必须抓住国计民生不可缺少的重要物资,例如粮食或能源资源等;如果过分追求眼前的巨大利益,一个国家的强项和特点反而可能变成弱点和陷阱;粮食等涉及国家安全的物资要牢牢掌握在本国手中,保持足够的自给率,而不能因受到外部巨大诱惑而放松经营。

直到今天,粮食仍被列为国家权力要素中自然资源部分的第一位。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汉斯·摩根索便把粮食视为国家各种资源中“最基本的资源”。他明确提出:“粮食自给自足永远是巨大力量的源泉”;“相反,粮食的长期匮乏是在国际政治中永远软弱的根源”。遗憾的是,摩根索没有读过《管子》一书,所以他只能引用美国、英国、德国、西班牙、印度等国的例子做比较。如果他了解《管子》中的上述精彩案例,或许会拍案叫绝的。

不过,管仲的经济谋略和伎俩虽可得手于一时,但却难保别国长久归顺,更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第124—125页。

谈不上称王,甚至还会埋下祸根,因而要维系霸权还须恩威并重,对待归顺的诸侯国更宽厚仁慈才行。

4. 以人为本,以德和人。《管子》认为,“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仲强调:“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故授有德,则国安。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令顺民心,则威令行。使民各为其所长,则用备。严刑罚,则民远邪。信庆赏,则民轻难。量民力,则事无不成。不强民以其所恶,则诈伪不生。不偷取一时,则民无怨心。不欺其民,则下亲其上。”

管仲强调,“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是故圣王卑礼以天下之贤而任之,均分以钧天下之众而臣之。故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世不谓贪者,其大计存也。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合天下之权;以遂德之行,结诸侯之亲;以奸佞之罪,刑天下之心;因天下之威,以广明王之伐;攻逆乱之国,赏有功之劳,封贤圣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管子认为获取天下并不是吞并别国,而是让所有诸侯国愿意服从周朝之礼,遵从齐国,相安无事。《管子》注张:“夫欲用天下之权者,必先布德诸侯。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与,有所谄,有所信,然后能用天下之权。夫兵幸于权,权幸于地。故诸侯之得地利者,权从之;失地利者,权去之。”总之,“夫先王取天下也术,术乎大德哉。”

(三) 如何维系霸业与王权

《管子》认为,“霸王国”如同天地运转的自然规律那样,新老交替改朝换代,为天下创建制度,给诸侯排序分封,受四海宾服,顺应时代潮流匡正天下。世界中心转移是一种客观规律,即霸权和王权不是固定在某个或某几个国家而永恒不变的,不过霸权和王权维持的时间长短却不同,时间的长短取决于维持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管子·牧民第一》。

《管子·牧民第一》。

“谄”同屈,“信”通伸,“有所谄,有所信”是说有屈有伸。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王权或霸权的政治能力。由于政治领导人的个人政治领导能力不同,因此维持王权或霸权的时间长短就不同。这种现象突出表现在王权国家或霸权国家变更政治领导人后,王权或霸权开始衰败。管子认为,霸权或王权的转移,是由于统治者的起了骄心,导致国内政策失调,继而失道寡助,最后导致失败。

1 兴不忘衰,胜不可骄。管仲清醒地认识到,国家强大到顶峰时便潜伏着衰落的危机。《管子》指出:“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然而与危亡为邻矣。天道之数,人心之变。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人心之变,有余则骄,骄则缓怠。夫骄者,骄诸侯,骄诸侯者,诸侯失于外;缓怠者,民乱于内。诸侯失于外,民乱于内,天道也,此危亡之时也。所以,霸、王之国要特别注意防止暴虐、骄傲、奢侈、放纵和懈怠,即“若夫地虽大,而并兼,不攘夺;人虽众,不缓怠,不傲下;国虽富,不侈泰,不纵欲;兵虽强,不轻侮诸侯,动众用兵必为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

2 顺乎民意,遵规受礼。《管子》认为,要想维持王权就必须保持争取人心的政策,以保证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而要保持它们的支持,就得有一项长久的正义的事业,光凭武力是无法长期维持王权的。他说:“古之圣王,所以取明名广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不忘于后世,非得人者,未之尝闻。”

《管子》要求王权国家通过实行王道来维持其地位。所谓王道,就是王权国家建立的一套合乎道德的礼制。只有各国都遵守礼制,王权秩序才能得以维持。管仲认为,最关键的是王权国家要带头遵守这套国家间的礼制规范,给其他国家作出表率。他说:“王道非废也,而天下莫敢窥者,王者之正也。衡库者,天子之礼也。……成功立事,必顺于礼义。故不礼不胜天下,不义不胜人。故贤知之君,必立于胜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甚至后来的孔子也认为:“礼之用,和为贵”,但有例外,即“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管仲认为,不仅维持王权需要带头遵守国家间的礼仪规范,维持霸权也离不开带头遵守国家间的礼仪规范。他认为,霸权国家通过律已才能成为他国的表率,才能让其他国家接受本国的盟主地位。例如,据《国语·齐语》记载,在

《管子·重令第十五》。

《管子·五辅第十》。

《管子·七法第六》。

孙钦善译著、宗福邦审阅:《论语注释》,成都,巴蜀书社 1990年版,第 8页。

葵丘之会上,周天子派使节慰劳齐桓公,允许桓公在面见使节时“不必下跪”,而这是违反周礼的,意味着齐桓公拥有与周天子平起平坐的地位。管仲劝齐桓公以臣子之礼跪见天子使节,得到诸侯国的一致称赞,从而最终奠定了齐桓公“春秋五霸”之首的地位。

《管子》认为齐桓公鼎盛时期达到了这种理想状态:“教大成,是故天下之于桓公,远国之民望如父母,近国之民从如流水。故行地滋远,得人弥众,是何也?怀其文而畏其武。武事立,文事胜,是故大国之君惭愧,小国诸侯附比。是故大国之君事如臣仆,小国诸侯欢如父母。夫然,故大国之君不尊,小国诸侯不卑。是故大国之君不骄,小国诸侯不慑。……不称动甲兵之事,以遂文武之迹于天下”。只有霸权国家带头守礼,其他国家才会自觉跟上。形成一种“动而无不从,静而无不同。举发以礼,时礼必得。和好不基,贵贱无司,事变日至”的理想状态。

3. 励精图治,自主自强。《管子》认为,国家兴衰存亡并不在于国家大小,人口多寡,而在于内外政策是否符合本国国情。《管子》用对比的方法指出:“国无以小与不幸而削亡者,必主与大臣之德行失于身也,官职、法制、政教失于国也,诸侯之谋虑失于外也,故地削而国危矣;国无以大与幸而有功名者,必主与大臣之德行得于身也,官职、法制、政教得于国也,诸侯之谋虑得于外也,然后功立而名成。”《管子》还发出警告:“天下皆治己独乱,国非其国也;诸侯皆令己独孤,国非其国也;邻国皆险己独易,国非其国也。此三者,亡国之征也。”作为国家“大而不为者复小,强而不理者复弱,众而不理者复寡,贵儿无礼者而复贱,重而凌节者复轻,富而骄肆者复贫。”

《管子》认为,如果一国君不明、将不贤、地不耕,该国就不保,即便是人多地广兵强的大国也会衰亡。《管子》指出三满为患,即“地大而不为,命曰土满;人众而不理,命曰人满;兵威而不止,命为武满。三满不止,国非其国也。”也就

《管子·小匡第二十》。

《管子·幼官第八》。这段话的意思是,君主有所行动,各国无不跟从;君主静守无为,各国无不随同。兴举事业,必据礼数,处事循礼,必有所得。保持和好,互不仇视,贵贱相安,不兴狱讼,这样,意外之事将被阻塞防止。

《管子·法法第十六》。

邻国都团结而唯本国孤立,邻国都有备难攻而本国易攻,国家就难保了。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是说,“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卿贵而不臣,非其卿也;人众而不亲,非其人也。”上述“三满”若得不到控制,就会给国家带来祸患,国家就安危难保了。《管子》以此来警示齐国上下励精图治而不懈怠,同时反对只靠武力扩张领土谋霸而丧失民心。

管仲虽辅佐齐桓公建立起齐国的霸主地位,但不主张分别与其他诸侯国结盟。其理由是:“先王不约束,不结纽。约束则解,结纽则绝,故亲不在约束、结纽。”这句话是说,先王不受约束、不结盟。受到约束便会分手,结盟则可能断绝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所以友好关系不必靠彼此约束和结盟。管仲还认为,先王不靠财物结交和割地结盟的方式统治天下。而只有顺乎潮流,合乎道义,才能得到天人相助。即,“时者得天,义者得人。既时且义,故能得天与人”。

三、睦邻、慎战、和谐

管仲认为,国家的存亡兴衰都与邻国有关。《管子》一书中称:“夫兵攻所憎而利之,此邻国之所不亲也。权动所恶,而实寡归者,强。擅破一国,强在后世者,王。擅破一国,强在邻国者,亡。”这句话是说,讨伐所憎恶的国家而把利益归己,邻国就不会亲近。以实力和权威打击作恶的国家而少取利归己,就会强大。专破一国,使后世强大可称王;专破一国,使邻国强大则会亡。

(一) 修近睦邻乐施王道

《管子》提出:“悦众在爱施,有众在废私。召远在修近,闭祸在除怨。备长在乎任贤,安高在乎同利。”这一至理名言堪称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睦邻政策思想与安国良方,对今天的当政者仍有重要指导意义。它告诉人们:要使民众喜悦就要乐于施舍;要得民众拥戴就要除去私心;要使远方宾客前来就要修好近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管子·枢言第十二》。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笔者认为,《管子·版法第七》这段话可视为管仲时期所做。《管子》一书中另外专门有一篇对《版法第七》加以解释引申的文章,即《管子·版法解第六十六》,这疑似为后人所作。若均系后人所作,恐无需特意分成两篇。

邻;要避免灾祸就要消除别人之怨恨;要谋求长治久安就要任用贤才;要安然处于高位就要与民同利。

《管子》还提出:“凡众者,爱之则亲,利之则至。是故明君设利以致之,明爱以亲之。徒利而不爱,则众至而不亲;徒爱而不利,则众亲而不至。爱施俱行,则说(悦)君臣、说朋友、说兄弟、说父子。”“凡君所以有众者,爱施之德也。爱有所移,利有所并,则不能尽有。”“爱施之德虽行而无私,内行不修,则不能朝远方之君”,“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礼义章明。如此则近者亲之,远者归之。故曰:‘召远在修近’”。“先王不以勇猛为边竟(境),则边竟安。边竟安,则邻国亲。邻国亲,则举当矣。”他强调:“先王取天下,远者以礼,近者以体。体、礼者,所以取天下。”

由此可见,管仲在本质上是反对霸道而主张王道的,制霸的目标是为王。即便国富兵强,获得霸王之本,作为王者对外也要坚持不扩张兼并,不傲慢无理,不结盟,不靠滥用武力,以道义、礼节、体谅相待,远和近亲。把邻国是否亲近作为对外举措是否得当的标准之一。

“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已成为今天中国周边外交的方针。笔者认为,时至今日,睦邻之道仍如君子之交,要彼此做到“邻厌我避;邻乐我喜;邻困我帮;邻恶我防;邻好我学”。

(二) 至善不战有备无患

《管子》主张“慎战”,认为用兵之道的最高境界是“至善不战”。这是因为“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管子》指出:“故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权者也。故举兵之日而境内贫,战不必胜,胜则多死,得地而国败。此四者,用兵之祸也。四祸其国而无不危矣。大度之书曰:举兵之日而境内不贫,战而必胜,胜而不死,得地而国不败。为此四者若何?举兵之日而境内不贫者,计数得也;战而必胜者,法度

《管子·版法解第六十六》。

《管子·枢言第十二》。

《管子·枢言第十二》。

《管子·法法第十六》。

审也；胜而不死者，教器备利，而敌不敢校也；得地而国不败者，因其民也。”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说，战争本身不是目的，而是用来辅佐王业和成就霸业的工具。但当今用兵的人却把工具当作目的，所以不懂得用兵必须权衡得失。于是他们发动战争造成国内贫穷，与敌交战没有必胜把握，打了胜仗士兵阵亡过多，夺得土地国家元气大伤。这样一来，国家就有灭亡之危了。因此，发动战争就得设法避免上述四种不利情况。

《管子》同时强调，国家备战要做到“器成教施”，“教器备利”，即做到武器精良，训练有素。其目的在于，一旦战争难以避免时能做到一战必胜。《管子》认为：“数战则士罢，数胜则君骄，夫以骄君使罢民，则国安得无危？故至善不战，其次一之。破大胜强，一之至也。乱之不以变，乘之不以诡，胜之不以诈，一之实也。近则用实，远则施号，力不可量，强不可度，气不可极，德不可测，一之原也。众若时雨，寡若飘风，一之终也。”这些话的意思是：屡战，士卒就会疲惫；屡胜，国君就会骄傲。以骄傲的国君驱使疲惫的士卒作战，国家怎么能不危险？所以最好是不战而胜，其次是一战而胜。攻破大国，战胜劲旅，这是一战而胜的典范。扰乱敌军不靠权变，凌犯敌军不靠诡计，战胜敌军不靠诈谋，这是一战而胜的实力。征服近敌要靠实力，征服远敌要靠号令，力量不可估算，强度不可测出，气概无可限量，德望不可衡量，这是一战而胜的源泉。兵增多时有如时雨，兵减少时有如飘风，这是一战而胜的终极表现。《管子》在主张慎用兵的同时指出，在战争中要做到“众胜寡，疾胜徐，勇胜怯，智胜愚，善胜恶，有义胜无义，有天道胜无天道”。

《管子》还主张师出要有名，即“兵不义不可”，“勇而不义伤兵”，“故军之败也，生于不义”。《管子》不赞成对有实力、讲道义的国家用兵，即“千乘有道，不可侵也”；但同时认为，对于商纣王那样的昏君，搞得民不聊生，就要“恶得伐”；当诸侯作乱而国家失控时要及时出手相救，否则难以称王，即“上位不

《管子·兵法第十七》。

《管子·兵法第十七》。

《管子·枢言第十二》。

《管子·白心第三十八》。

《管子·法法第十六》。

能为功更制,其能王乎?”

管仲认为,霸王之国要讲信义,善待邻国而不宜扩张远征;小国则不宜图谋坐大而徒劳争名。正所谓“功成而不信者,殆;兵强而无义者,残;不谨于附近而欲求远者,兵不信”;“国小而修大,仁而不利,犹有争名者,累哉是也”。因此,“万世之国,必有万世之宝。必因天地之道,使其内无使其外,使其小无使其大”。

在政治实践中,管仲力主齐桓公做中原霸主,但并不赞成先强兵动武,而应先考虑民生。在管仲辅佐齐桓公的前五年,齐桓公不听管仲劝谏,屡战屡败。管仲则以国为重,反复进谏,阻止战争,并最终说服齐桓公以外交获得各诸侯国的亲近。这并非君臣之间的义气之争,而是两条对外战略之争。齐桓公的战略是通过增强军备,发动战争,征服近邻,争做霸主。管仲的对外战略则是通过优先发展国内民生,提高综合国力,同时对邻国采取怀柔敦睦的政策,争取各国拥戴,共同抵御周边狄蛮。实践的结果是齐桓公最初刚愎自用,但处处碰壁,只能靠管仲挽救危局,最后只能对管仲言听计从。

(三) 御外敌先谋内和

管仲认为,要取得御敌战争之胜利,首先要形成内部的团结与和谐。《管子》兵法中说:“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辑以悉,莫之能伤。”这是中国古典中最早论及“和谐”的一段话,其大意是:用道来促使人们致富,民就和睦;用德来培养人们心智,民就合作。衣食足而有道德,就能和平合作。和睦合作就能和谐,和谐就能齐心协力。尽力做到这一点,就可以抵御任何敌人的伤害。

管仲强调,要做到以上要求,国君就要“质信极仁,严以有礼”,因为“信也者,民信之;仁也者,民怀之;严也者,民畏之;礼也者,民美之”。具体说来,“泽命不渝,信也;非其所欲,勿施于人,仁也;坚中外正,严也;质信以让,礼也。”

《管子·侈靡第三十五》。

《管子·侈靡第三十五》。

相关记载请见《管子·大匡第十八》。

《管子·兵法第十七》。

《管子·小问第五十一》。

作为统治者,管仲还告诫齐桓公“凡牧民者,必知其疾,而忧之一德,勿惧以罪,勿止以力。”因为“不知其疾则民疾,不忧以德则民多怨,惧之以罪则民多诈,止之以力则往者不反,来者骛距”。管仲对内强调和谐,对外主张以利害人、以德和人,形成了当时齐国巨大的软国力,加之齐国国富兵强的硬实力强大,两者循道而用,最终“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四、结语与启迪

从表面上看,《管子》的“霸王学”与摩根索为代表的美国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理论似有相通之处。例如,两者的共同点是:人的本质是重视利益的;都认为利益对于国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处理国家间关系必须重视利益;都认为国家间关系的本质就是谋求、保持、增加、运用或显示权力;都强调拥有和使用强大的军事实力是建立霸权的重要手段等。

然而,管仲的战略思想和理念,在本质上与当代西方现实主义流派有明显区别。首先,西方权力政治理论中没有王权的概念和王道的思想,只谈到霸权。而《管子》则对霸权与王权作出明确区分。其次,管仲实现霸业王权的途径和方法与其说是接近现实主义,不如说更具有理想主义、建构主义的色彩,与中国孙子、孟子、墨子等有关不战非攻的思想有一脉相通之处。在春秋初期几乎每年都发生新战争的情况下,管仲却能辅佐齐桓公不用兵车武力而成为诸侯国拥立的盟会之主,与其慎战、睦邻、和谐的指导思想和成功实践密不可分。另外,管仲不仅重视加强农业、军事等硬实力,而且强调发挥德与道义的软实力,并率先遵守国家间关系的规则,不谋一己之私,使各国心悦诚服。《管子》作为中国战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为中国 21 世纪加快和平发展,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起到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

管仲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不恃强凌弱,而扶弱济贫等战略文化底蕴。管仲强调,“强而骄者损其强,弱而骄者亟死亡”。大国君主谦卑,小国才愿亲近;大国君主处事如公仆,小国才高兴地视其为父母。这

《管子·小问第五十一》。

《管子·白心第三十八》。

样不用武力就能得到天下。实际上这是一条成功的以硬国力为后盾、软国力为先导的外交方略。管仲临终前在病榻上还没有忘记叮嘱齐桓公将来放弃占领楚国的土地,以免引来祸患。遗憾的是,齐桓公未遵照管仲遗嘱行事,结果引来杀身之祸。

《管子》一书与其说是为普通人而写的,不如说是留给后世当政者的一部执政典籍。“悦众在爱施,有众在废私。召远在修近,闭祸在除怨。备长在乎任贤,安高在乎同利。”这些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精华的思想具有超越时空的影响力。《管子》一书留给现代人的重要启迪还包括:举长治乱、和内御外;国富兵强、兴农为本;利民亲民、上下和谐;推崇道义、亲邻睦邻;以人为本,治乱在上;以德和人,一统天下;善于谋略,以备待机;重视守备,防患未然;审时度势,见机而作。这些对当代和未来中国领导人经营内政外交,都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